

Social Worlds, Actor-Networks and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Cholesterol, Dietary Fat and Heart Disease

Author(s): Karin Garrety

Sour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7, No. 5 (Oct., 1997), pp. 727-773

最後三小節 (pp. 753-58) 的重譯

簡羽君、易俊宏、李佳瑜、柯雲皓合譯

林宜平校定、傅大為協力

22/Feb./2012

(簡羽君翻譯 P.753-P.754)

行動者網絡、「社會成因」與爭議

就某些層面而言，膽固醇爭議支持「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聲稱：科學知識是藉由招募盟友建構的。不容置疑的是，改變飲食的倡導者相較於懷疑論者，更有能力建置一個更大、更堅固的網絡，他們能轉譯更多人的利益。然而，如果我們不訴諸 Callon 和拉圖(Latour) 他們認為不正當的那種社會解釋，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人相信低脂、低膽固醇飲食能對身體帶來益處。

行動者網絡理論主張，在知識建構中非人行動者應該與人享有同等地位，所以它排斥將社會因素視為解釋的資源。為論證這樣的立場，他們非常依賴「無科學知識爭議」的個案研究——亦即很容易辨識非人行動者行為的個案。行動者網絡理論依靠非人行動者或「自然」本身來平息爭議。就如 Harry Collins 和 Steven Yearley 指出，這些解釋看起來很像舊實證主義對科學的描述：爭議在科學發現自然的「真相」後終結。在聖布里克灣(St Brieuc Bay)扇貝養殖的研究中，Callon 將扇貝行為的不確定性與「爭議」二者的終結，都歸因於扇貝的決定性行動。Latour 宣稱他論述最詳細的案例研究，《法國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是以無爭議的科學知識為基礎，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強個案(hard case)：似乎其中「真相」非常明顯，完全不需要多餘的社會解釋。如果拉圖能夠呈現：甚至連巴斯德(Pasteur)都需努力徵招盟友與建立網絡，那麼他就能證明「真實」科學知識的產生，不過就是同盟的成功建立。然而，選擇這樣的個案研究，拉圖讓他自己輕鬆得分。他對巴斯德成功的解釋，高度仰賴巴斯德從細菌所得到的合作。

但在長久而持續的爭議中，「自然」其實更捉摸不定、難與合作。在膽固醇的爭議中，「自然」是人與非人行動者的複雜混和體——心肌和動脈與脂肪及膽固醇分子交互作用。儘管經過協同的努力，改變飲食的擁護者無法促使這個複雜

的混和體成為他們一個可信且前後一致的盟友。不同於巴斯德的個案，擁護者無法呈現任何充分的「證據的劇場」去說服懷疑者。如果說膽固醇假說在某種程度下成為真的，那麼它是藉由人的想法與行動，而不是非人的說服力量來促成的。在形塑飲食和心臟疾病知識的過程中，有許多典型的人為社會因素，如：美國健康改革運動的悠久傳統；食品工業的廣告影響；大眾飲食愛好者與正統醫學的科學家間的邊界爭端；將飲食改變整合進社會運動中，它針對因富裕而產生的不健康副作用「努力要作些事情」。

社會世界、多重意義，以及權力

（易俊宏翻譯 pp.754-56）

在膽固醇爭議的分析中，試圖藉由眾多社會世界的交互作用，呈現有關飲食和心臟疾病知識與政策的建構。在本節中將更細緻的討論社會世界理論。雖然此理論為調查長期的科學爭議提供了寶貴的分析框架，但其理論的實踐，卻常未能充分利用其可能性。因此，下文將呈現贊同與批評的觀點。

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和符號互動，都強調知識是透過協商與轉譯（translation）而建構出來的。兩者都排斥社會決定論，多傾向研究行動者的言論和行為。然而，儘管社會世界理論家 Fujimura、Star 以及 Clarke 等人，都同意在社會學的分析中應納入「非人」，但她們在實作中卻賦予「人」較多的能動性。

ANT 在描繪知識發展的扁平轉譯鏈中，行動者要不是「背叛」網絡，就是全然效忠，但是社會世界分析將知識建構視作為包含多重觀點的競技場，因而容許行動者的內在矛盾及多重意義。藉由「懶人包」（標準化套裝包 standardized packages）以及「邊界物」（boundary objects）等概念，強調人在面對模稜兩可的科學目標和「事實」時進行意義賦予的核心角色。Star 和 Griesemer 如此定義邊界物：

…科學標的物（scientific objects）座落於數個交疊的社會世界中，**並且**滿足每個團體的訊息需求。它們是可塑的，足以適應在地的需求與不同團體的使用條件，同時又足夠強韌，能跨越多個場域而維持共通的同一性（common identity）…這些標的物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具體的。

在許多方面，連接飲食脂肪和膽固醇冠心病的一大堆知識宣稱，是一個邊界物，在不同的社會世界中有不同的意涵、用途和影響。

接受和納入對於「事實」的多重詮釋，讓社會世界的理論框架對爭議的研究調查非常有用。然而，好的研究調查，不僅僅是呈現各種反對意見，某些權力分析也是必要的，如此才能找到某些在社會世界中的行動者如何、以及為什麼要將其對事實的定義強加於人。符號互動論經常被批評，很難進入社會結構及權力問題的框架中對話。部分社會世界對科學知識建構的分析，確實值得批評。他們強調多重觀點，卻迴避描述如何、以及為什麼有些詮釋會「變成真實」，而另一些則被壓抑或忽略了。例如，有關墮胎藥 RU486 多重描繪的研究，Clarke 和 Montini 迴避權力分析，並且認為這樣的分析僅僅是「分析性地重溯支配的權力關係」。有別於權力分析，符號互動論者藉由尋找和放大受害者的聲音，來補救我們所感受到的不平等。Fujimura 認為，社會世界取徑的優勢，是「鼓勵新的聲音說話，自我再現(representation)，或是關注於他人的再現。」Star 也有類似的建議，認為科學社會學家「首重多樣性」。

(以下李佳瑜翻譯，原文頁 756-57)

雖然這些分析都未強調權力的分佈與運用，符號互動論者並非無法進行這樣的分析。不像行動者網絡理論，它並未排除社會結構的因素；更有甚者，社會世界理論特別適用於探究人們如何創造、維繫與運用社會結構，並努力將意義賦予彼此對方。Clarke 也指出「社會世界是結構單位—結構性的框架—而協商的社會秩序便是從中建構與重組。」行動者網絡理論忽略行動者的差異，只關注他們是不是網絡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社會世界理論則鼓勵行動者間的差異分析。以蛋商遊說者為例，他並未享有美國心臟學會主席所具備的認知權威與資源。不同行動者所能掌控的資源與潛在行動建構了許多結構條件，它們進而型塑了權力鬥爭的結果，並賦予爭議特色。

前文開展出醫療宰制(*medical dominance*)的概念，貼切地概述醫療實務工作者如何將意義加諸在他人身上，可說是符號互動論者處理社會結構與權力的良好範例。像醫師、律師、科學家等專業人士通常掌握權力，以 Clarke 的話來說便是「為其他集體行動者界定情勢（或其主要因素）」。然而，這項權力並非萬年磐石，而會隨著人類行動改變：「唯有行動方能展現權力，這也關係各種參與者長期透過持續的行動尋求與獲致正當性。」

雖然醫師與科學家握有界定飲食與心臟病「事實」的大權，但這項權力從來不是絕對的。不可否認，醫師與科學家對膽固醇假說的意義與關連並沒有共識；而這些差異也被相互競逐的社會世界操弄。即便如此，數十年來，改變飲食的倡議者仍可利用像美國心臟學會、國會、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國家膽固醇教育計畫來消除反對的聲音。

總結（翻譯 | 柯雲皓）

與飲食中的脂肪、膽固醇、冠狀動脈疾病有關的知識與政策建構，是一個複雜、漫長的過程，這樣的過程無法與戰後美國文化與政經環境切割。早在新知識由實驗室中逃脫之前，許多社會世界的行動者就開始發展讓不穩定的假說蓬勃發展的條件。他們創造了心臟疾病的社會問題與其解決方法—大量的醫學研究成果。許多強烈相信飲食有預防與治療效力的人，以及非專業的社會世界都參與新知識的產出。這種信仰，以及一些食品製造商的廣告宣稱，威脅到醫學的支配地位。而醫學組織也首次以對飲食改變作初步背書，以為回應。

雖然科學「證據」依然難尋，飲食改變仍在許多社會世界中越來越流行。受到刺激的飽和脂肪產業與抱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同盟，企圖推翻膽固醇假說的科學接受度。這些邊界鬥爭的結果受到如國會和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社會機構的影響，也促使許多社會世界結合起來，讓對立的宣稱能有進一步討論與評判。在許許多多場域，科學與政策的社會世界相互結合。最後，飲食改變的倡議者不再追求一個「決定性的證據」。

徵召與延攬同盟，對相信膽固醇假說的人取得「勝利」至關重要。然而，行動者網絡理論倚賴非人解決爭議，並且禁止將社會因素納入考量，所以無法妥善處理「真相」是來自團體間以不同詮釋進行權力鬥爭的持久爭議。社會世界理論提供一種更開放且更具彈性的框架來研究這種情境。更重要的是，它所含的可能性不僅止於「鼓勵發出新的聲音」。為理解為何某些聲音相對清晰且更為響亮，我們需要探究，行動者們如何透過意義的協商，在社會世界的交界處運作權力。